

对“特殊工人”的残害

抚顺煤矿“特殊工人”中 我被俘人员的斗争

尉常荣

“特殊工人”系指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以战争手段从关内抓到东北服苦役的“工人”。“特殊工人”的成份比较复杂，其中有我军被俘人员和解放区政权组织、群众组织的工作人员。此外，还包括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和平民百姓等。在抚顺的我被俘人员，一部分直接来自关内敌俘虜收容所，大部分来自黑龙江省。这部分人先在日军的军事工程和日伪指定的为战争服务的重要产业做苦工，后又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做“特殊工人”，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

“特殊工人”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大侵华战争中出现的，是日本侵略者在我国犯下的严重罪行。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进攻苏联，在东北大肆推行大规模掠夺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军事工程建设的“北边振兴计划”，急需数以万计的工人。然而东北地区劳动力严重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关东军于1941年4月5日，同驻华北日军达成了关于紧急动员工人入“满”的协议，明文规定把战俘和其他关内被捕人员押送到东北，当“特殊工人”。

抚顺炭矿从1940年12月龙凤采炭所接受168名“特殊工人”始，至1941年12月底，来抚“特殊工人”总数达6 312人。1942年6月30日后，又按伪满洲国民生部审议的所谓《辅导工人处理要领》，将“特殊工人”中的战俘称“辅导工人”，先后分四批被押送到抚顺炭矿，其中前三批的4 327人中，有我八路军干部48人，战士1 511人。

“特殊工人”到抚顺炭矿后，日伪当局首先进行身份调查，取指纹、照相、登记注册，一律被集中在指定的区域内居住，其宿舍周围有铁丝网，由日本人看管。“特殊工人”没有人身自由，上下班都有武装人员押送，也没有通信自由，来往书信包裹都要经过严格检查。1941年1月，老虎台采炭所250余名“特殊工人”集体逃跑，日警务处特务科长警佐今泉丰太郎接到通报后，立即率领20名日本警备队员和一批警察跟踪追击。追到抚顺西部制铁工厂附近时，看到逃跑的“特殊工人”正在强渡浑河，刽子手们立即架起机枪扫射，连打死带淹死，当场就牺牲60余名。后来追到李石寨又开枪打死两名，并把其余逃跑者都抓了回来。

为便于管理，日伪按军队的组织形式，把“特殊工人”编成中队（200人以上）和小队（50人以上）。队长由“特殊工人”中原来是军官或有影响的人物担任，并由日伪任命。日伪对他们既严密监视，又给以较“优厚”的待遇，以此收买、拉拢这些人，利用他们的威信去拢络其他“特殊工人”。

“特殊工人”集中在西露开矿事务所、大山、老虎台、龙凤等采炭所，从事最艰苦的采炭掘进、支柱、线路等作业，在日伪军、警、宪、特的监视下，每天要从事10至12小时的繁重体力劳动，劳动强度之大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特殊工人”的工资很低，一般采炭工平均每日一元八角左右，其他工人一元六角左右。但“特殊工人”每日只能拿到五角的饭票，这种饭

票只能在满铁经营的工人食堂和卖店里使用。当时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特殊工人”定量很低，伙食极其恶劣，毫无营养可言，他们吃不饱，也穿不暖，经常光着膀子，赤着脚在矿井下劳动。他们居住的条件也很差，传染病经常流行，死人的事经常发生。1943年4、5月间，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工人宿舍发生霍乱病，因得不到治疗，有几十名工人病死。日伪当局怕霍乱蔓延，影响煤炭生产，竟将这一地区封锁起来，命令万达屋诊疗所日本医师注射毒药将10名霍乱病患者毒死。

1941年6月9日，日伪当局搞了一份《特殊工人对策备忘录》，提出在有“特殊工人”配属单位设置侦探工作网，对“特殊工人”进行谍报、阴谋和宣传三方面的秘密战。同年8月15日，为加强战时的防卫工作，抚顺炭矿成立了特务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特殊工人”的“宣传”和监视。同年8月27日，抚顺炭矿又制定了《抚顺炭矿工人动向取缔计划》，建立炭矿警备队，组织预备队，并将警护团的一部分武装起来，用以对付“特殊工人”，镇压工人运动。1942年7月以后，抚顺炭矿又设置了工人辅导班、警备员、防卫班等反动机构，以加强对“特殊工人”的管理和监视。1944年，日伪在奉吉铁路沿线的章党站、前甸子站、抚顺城站，及奉抚沿线的抚顺站、大官屯站、瓢儿屯站、李石寨站和奉抚路各汽车站，派遣移动防卫员，在铁道警护队的协助下，负责防止“特殊工人”逃跑。

1943年11月，日本侵略者将400余名有投苏嫌疑的“特殊工人”，从与苏联接壤的黑龙江省东宁县，押送到抚顺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井服苦役。这400余人中有八路军军政人员（多半是决死一纵队的干部和战士），还有国民党被俘的官兵等。他们被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陈多，下设三个小队，第一小队队长鲁

福祥，第二小队队长孟昭林，第三小队队长张相哉（我决死一纵队连长）。

这400余名“特殊工人”在矿井下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其劳动所得全被炭矿占有，日本人不给他们开工资，不给他们发衣服、靴子等劳动保护品。在把头盘剥下，他们得到的米、油、酒等生活必需品寥寥无几，难以维持生活。为此，“特殊工人”向劳务系提出强烈要求：“给东西不经过劳务系把头手，同洋工待遇一样”。日伪当局长期不予答复。于是“特殊工人”便三五人合在一起，拿炭矿的一些东西，想方设法到街上卖，弄些钱买生活必需品。日本人和把头发现后，对他们非打即骂，严加惩处，致使“特殊工人”与日伪的矛盾日益激化。

1944年2、3月间，三小队在五区采煤，掌子里到处都是水，工人没穿靴子，衣服单薄，无法进行生产，加之炭矿一直没给他们开工资、发衣服，所以“特殊工人”们的反抗情绪十分高涨，纷纷提出：“不发工资，不给衣服就休工”。为了发动工人开展斗争，张相哉召集鲁福祥、孟昭林开会，决定向劳务系提出工人的要求，如不答应，就领导工人罢工。会后，他们到劳务系交涉，明确表示：“劳务系不给开资，不发衣服，就不上班”。劳务系不予理睬。当夜，张相哉等三位队长把罢工的决定告诉了全体工人。第二天早晨，在张相哉同志的领导下，罢工开始了，400余名“特殊工人”都聚集在大房子里，没有一个人下矿井干活。把头看到这一情况，立即到劳务系向鬼子冈村报告。冈村一听也慌了神，来到大房子，强作笑脸，点头哈腰地讲了一些好话，哄骗工人上班，说上了班就给开资、发衣服。工人们谁也不听他的鬼话，都说要叫我们上班必须把工资、衣服拿来，不开资，不发衣服，我们就不上班。冈村气得火冒三丈，他凶相毕露，“刷”地抽出洋刀，跳到桌子上，口出狂言，命令

大家立即上班。工人们被激怒了，他们高举拳头，一齐上前，把他包围起来，怒目而视，声言和他拼命。冈村害怕了，脸色蜡黄，举起的洋刀不由自主地放了下来，但还是威胁说：“我死了不要紧，你们中国人不知要死多少！”工人们毫不畏惧，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怕死！”冈村一看不好，慌慌张张地跳下桌，从人群中钻出去逃跑了。工人们见了，无不拍手称快。最后鬼子屈服了，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补发了工资，发给了衣服。“特殊工人”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特殊工人”的斗争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惧，他们暗地里逮捕了罢工领导人张相哉同志，并把他关进新屯新正辅导院。尽管如此，“特殊工人”没有屈服，仍然继续坚持斗争。

1943年冬，天气十分寒冷，为了解决取暖问题，刘兴起同志让白同仁、杨长海从矿坑捎些煤回来生炉子。烧炕。这两名工人背煤往回走时，被日本人搜查发现了，就把这两名工人领到劳务系，说他们偷煤，把他俩打得死去活来。刘兴起同志立即组织六七十名工人赶到劳务系，痛打了搜查边，砸了劳务系，救出了白同仁和杨长海。事情发生后，一位老工人十分关切地给刘兴起同志弄了一张通行证，让他贴上照片，拿着赶快逃跑，但刘兴起同志没有走。第二年春，日本人突然把打过边的劳务系的几十名工人都抓了起来，带到警务处，对他们严刑审讯，最后把刘兴起、白同仁和崔秀奎三人投入抚顺监狱。

1944年2、3月间，夏俊卿同志在龙凤戏院看戏，当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人了解到他是我被俘人员后，便小声地和他攀谈起来。他对夏俊卿同志说，他叫李状太，是冀南军区政治部的，这次奉上级的命令来抚顺，是为了动员和组织被俘的同志逃走，先到阜新南山，然后回部队。他比较详细地说明了逃走的路线、注意事项和到南山后接头的方法。夏俊卿同志听了以后，好象

遇到救星，非常高兴，跑回大房子后，就把这件事和宋庆昌、高成章、严迟峰等人讲了。同志们听了以后欣喜若狂，谁也不愿再给日本人干活了，恨不得一下逃离抚顺，返回部队。宋庆昌、马振江等同志立即进行秘密串联，要大家准备食品，准备随身携带的武器，争取尽快行动。由于警惕性不高，这件事被四小队的李文俊知道了。李文俊是个伪宪兵，因贪污被送到龙凤矿，和“特殊工人”一起干活，由于他和严迟峰闹过纠纷，有仇，就把严迟峰告了。严迟峰被捕后，受刑招供。接着，日本人把小队长以上的“特殊工人”全抓了起来。经过一个月的严刑审讯，最后以政治犯的罪名，判处宋庆昌、夏俊卿等人有期徒刑，并把他们送交新屯矫正辅导院关押起来。

宋庆昌等人被关押起来以后，我被俘人员不畏强暴，仍然继续坚持同敌人作斗争。马振江同志经常秘密召开会议，找人个别谈话，给大家讲形势，讲毛主席的著作《论持久战》坚定大家信心，与敌人斗争到底。在他的发动和组织下，我被俘人员经常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秘密地进行革命宣传。一次，十小队队长戴玉文，带领5名工人与敌人展开搏斗，打死1名日本人和2名警察，后逃离抚顺。敌人发狂了，竟以所谓“抚顺龙凤地区检疫检查”为名，挨门挨户地翻箱倒柜，进行大搜查，结果有34人先后被捕，并遭到了严刑拷打，然后被关进了矫正辅导院。

为了防止“特殊工人”闹事，日伪在工人宿舍周围增设了一道电网，并派出武装人员巡逻、监视，严禁“特殊工人”随意行动。在这异常困难的情况下，马振江同志及时召开秘密会议，鼓励大家坚持斗争，“拿出在关内抗战打日本时的精神来，坚决同日本侵略者斗到底”。1944年冬的一天深夜，小队长崔云桂带领40余名工人，冲破层层封锁，砸了一家日本商店，把店

里的东西拿出来，分给了当地群众，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给了日伪当局以有力打击。

我被俘人员被关进监狱和矫正辅导院后，仍然继续坚持同敌人作斗争。宋庆昌同志在矫正辅导院又很快团结了一些人，并以怠工的形式进行斗争。原冀东八分区的张继武同志是个副营长，他趁敌人不备，夺下了看守的枪，然后带领几个同志暴动逃走。可惜枪内无子弹，结果暴动失败，被抓了回来，遭到残酷迫害。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日军节节败退，这时，日本人也不让他们干活了，把他们全锁在牢房里。不久，日本人也看不见了，只有伪监警在看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想离开辅导院，到外面去参加斗争，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但辅导院是铁窗、铁门，周围有电网、深沟，还有岗哨、流动哨。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集体暴动，并想出了冲出去的办法。最后在宋庆昌同志的率领下，人们冒着生命危险，砸碎铁锁，打开牢门，终于逃出了虎口，获得了自由。

1941年11月至12月这两月中，我晋绥军几百名被俘人员，被日本侵略者由山西省太原集中营分批押送到抚顺炭矿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属井当“特殊工人”。当时在万达属工人宿舍一一八栋及其附近居住的“特殊工人”中，有晋绥军二一二旅本部作战参谋高品同志（原名王敬堂）^①；二一二旅政治部秘书马苏义同志（在抚顺化名杨三春）^②；二一二旅五十六团副团长熊吉顺同志。这3位同志于11月12日到抚顺后，就急切地想找地下党

^① 高品，1934年入党，曾任我军二一二旅侦察科长、作战参谋等职。1945年返回部队后，其党籍被恢复。党龄从1934年4月入党之日算起。1961年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学院训练部部长，大校军衔。

^② 马苏义，1940年7月入党，曾任我军二一二旅政治部秘书等职。1942年11月返回部队后，其党籍被恢复。党龄从1940年7月入党之日算起。1961年他任武汉军区文化学校政治部副主任。

组织接关系，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斗争。当时，日本人对我被擒人员监视得很严，尽管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但终未能找到地下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南品等同志一致认为，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持斗争，而要斗争就必须组织起来。于是他们同有关党员商量，秘密地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党支部的工作方针是“团结被俘人员，继续与敌人斗争，继续为党工作”。

我被俘同志每天要在矿井下从事10余小时的繁重劳动，睡眠不足，吃不饱，穿不暖，加之居住条件极其恶劣，生病的人日益增多，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生病的同志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日本人不仅不把牺牲的同志安葬好，反而把他们的遗体弄到外面，一层一层地堆起来，堆放在我被俘人员面前。大家见了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提出“宁可砸死，也不愿等死”、“争取英勇的死，反对屈辱的生”！都想尽快地逃离虎口，返回部队，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党支部根据同志们的要求，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逃走问题。最后决定在18日领工资后，尽快地组织工人暴动逃走。

为了争取胜利，在一切准备就序的基础上，党支部又秘密地召开了会议，制定了暴动的行动计划：1. 向热河方面靠近（因热河有我部队），争取尽快地和我们的部队取得联系。行动的路线是“从抚顺出发后，先向西北方前进，经过石黄屯、乱石山、大屯、卧牛石、大治进入兴安南省的仓皇庙、前粮三台、东哈拉勿索，进入白杏吐，由该处前往兴安西省或热河省”^①。2. 由于情况不熟悉，应先进山再摸底，不行也便于和敌周旋。3. 开始不作大的惊动敌人的活动，以便能迅速摆脱敌人，隐蔽入

^① 见抚总庶文01第6号11/54《特殊工人不稳定集团逃走并检举の（第二报）》。

山，有利活动”^①。为适应新的情况，支部又作了分工。熊言顺同志负责全面工作（后他未参加暴动，不久牺牲于万达屋），南品同志负责军事指挥，高光鉴同志负责宣传工作。马苏义和李新民二同志的工作未变动。这次会议前后，在高光鉴同志的组织下，写了大批传单，准备在沿途散发。传单上写了下列口号：“工友们团结起来吧，向抽吸我们血膏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开战吧！”“配给制就是最压迫剥削我们的最高表现！”“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吧，为求自己的自由和解放向奴役统治我们的敌人进行斗争！”

1941年12月21日晚9时，暴动开始了。在夜幕的掩护下，暴动工人大手持扎枪铁棒等武器，三三五五秘密地经过万达屋菜市场北侧，向龚家甸汇集。队伍集齐后，在南品等同志的带领下，首先破坏了电网，然后非常有秩序地向北挺进。深夜11时到达浑河岸边，这时浑河已结冰，尚未冻实，一踩上去就落入水中，弄得满身是冰水。为了迅速逃离虎口，加快进军速度，他们不怕天寒地冻，纷纷跳入齐腰深的冰水中，用铁棒探路，涉水而过。过河后，北风怒吼，每个人的衣裤都结了冰，异常寒冷，行动十分不便。但他们的血是沸腾的，情绪十分饱满，没有一个人叫苦，都精神抖擞地向前进。暴动大军于22日1时许，到达前甸子村东二道房屯，在那里找了1名叫邵秉麟的农民作向导。后经鲍家屯，于2时许到靠山屯，又找了1名叫王子荣的农民作向导。在此以后，南品同志拿着指南针在前面带路，于清晨6时许到达三家子村。这时晨曦初起，虹云焕彩，已经天明了。为了防止暴露目标，队伍开进一个大院进行休整。

22日早5时20分，王子荣的家属到抚顺城警察署前甸子分

^① 见南品同志的《第二次回忆1941年特殊工人活动情况》（未刊稿）。

驻所报告，说八路军夜里从靠山屯路过，并将王子荣带走。前甸子分驻所马上向上级报告这一情况，反动当局闻讯后，惊恐万状，立即通报周围各地宣布戒严，封锁一切交通要道，并中断了山海关——东北的铁路交通。群众听到我被俘人员暴动的消息，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一致赞扬说：“八路军真行，敢暴动，有骨气！”抚顺城警察署接到急报告，紧急召集20余名警察，组成讨伐队，乘汽车向三家子扑去。8点30分，暴动工人在大院里吃早饭，忽听见远处传来了汽车马达声，知道敌人来了。南品同志立即指挥队伍从大院撤出，向北转移，并迅速地占领了北山，准备与敌战斗。敌人看到暴动工后，立即从汽车上跳下来，齐向北山涌去，很快地把北山包围起来，并在山脚下架起机枪，疯狂地向山上扫射，一时间，三家子村硝烟弥漫，枪声大作。暴动工手中没有枪炮，所占的又是一座秃山，难于隐蔽接近敌人，只能在沟崖里跑动，与敌周旋，伺机行动。敌人逐渐缩小包围圈，最后，暴动工有3人牺牲，40人被捕，其余逃跑。接着，敌人于附近地区继续搜查，第二天上午又捕获9名暴动者，都送进抚顺监狱。

24日，反动当局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工人暴动一案。会后，抚顺县警务科、抚顺城警务署、抚顺市警务处特务科和抚顺宪兵分遣队的49名警察、特务和宪兵，分别深入各地，对工人暴动一案进行追查，找证人，取证据，查与暴动工有牵连的人和单位。

被捕工人在审讯中遭到了严刑拷打，敌人逼他们说出暴动的领导人，但这些同志宁死不屈。南品等支部领导同志暗中商量，决定把暴动的领导人定为死者王振（临时编造的名），将责任都往他一个人身上推。他们设法把支部的这一决定告诉同志们，并鼓励他们要严守机密，坚持同敌人斗争到底。就这样，在

审问时，大家一个调，都说：“想回家，到关内去，跟着别人跑出来的，领头的是王振”。敌人听了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给他们加刑，什么皮鞭抽、镐把打、灌凉水、上大挂、冷冻、过电等酷刑都用上了。这更激怒了被捕的同志，他们抱着同生共死的决心准备就义，因此都挺上了，就是不交代，都认为“横竖就是一条命”，任你随意用刑。有的同志被打得晕倒在地，几十分钟不省人事，但被水泼醒后，仍然坚持说暴动的领导人是王振。于是暴戾的刽子手更加凶狠地摧残我被捕同志，把他们打得死来活去。后来由于个别群众受不了酷刑，讲了一些真情，加之敌人从三家子村弄来6个人到被捕工人中辨认，指明了南品等同志是暴动的领导人。南品等同志暗中商量，认为再隐瞒下去，会使同志们反复受刑，付出更大的代价，“不如以自己的死，换取多数同志的活”。于是由南品同志用铅笔写了一封信：“诸位：对不起，为了我们祖国的解放和自己自由，而要挣扎到最后一分钟。因此不得不和最亲爱的伙伴们告别了，希望你们在不久的将来也能一样地走在为祖国胜利的光明的道路上，做一个万古流芳的民族英雄。胜利就在我们眼前，要记住，牺牲自己才能换取光荣和幸福。别了，在胜利的大道上再会吧！”这封信交给同志们以后，南品、高光鉴和李新民3同志指着其他被捕同志，傲然地向敌人宣布道：“他们参加暴动完全是我们命令的，我们是指挥者，与他们无关！”于是，两个来月的严刑审讯结束了，南品等3同志以暴动主谋的罪名被关押起来，其他46名暴动工人大部分“经严厉说谕、训戒”后，于2月10日被“释放”，回万达屋。

我被俘人员回万达屋以后，敌人把他们一律打发到井下，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准他们请假、外出，连一天休息的时间也不给。把头和管帐先生天天到大房子里查看，驱赶他们下

并劳动。对病号，不是打就是骂，百般刁难，残酷折磨。敌人还派一名原国民党军队的少校营长住在大房子里，当房长，日夜监视他们。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营养的严重缺乏，使得多人生病，以致病死。党员梁义江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折磨死的。

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为了把广大党员和群众组织起来，继续坚持斗争，经马苏义、吕希超、贾奎来等几名党员同志商量，又秘密地建立了临时党支部，由马苏义同志任书记。

临时党支部建立后，通过个别谈话，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暴动失败的教训，使大家深刻地认识到，这次暴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对东北的情况了解得不够充分，没有看到敌人过于强大，统治极其严密，交通十分方便等因素，错把东北和关内一样看待，以为只要进山行动就可以自如了。这种想法过于天真，不符合实际。加之支部领导，党员和群众存在有严重的急躁情绪，准备不充分，结果导致失败。暴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它是惊天动地的英雄行为，给了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扩大了党的影响，充分反映了我广大被俘同志不屈不挠，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1942年开春后，由于“特殊工人”挣的钱有限，不能换季，大家仍穿着破烂不堪、不能遮体的棉衣，弄得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十分难看，群众对此不满，怨气冲天。为了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斗争，临时党支部提出了“反对打骂争人权，反对饥饿争生存”的斗争口号，要求反动当局给工人增加工资，医治疾病，保障工人的生命安全，改变童工的号头。临时党支部提出的口号和要求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日本人怕事情闹大了，影响煤炭生产，被迫答应给工人提高工资，改变几个童工的号头，同意给工人治病，送李关生进抚顺医院住院治病。“特殊工人”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为了和抚顺的地下党组织接关系，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斗争，临时党支部多次派人到外面去寻找线索，进行联系，但始终没有找到地下党组织的同志。鉴于这种情况，党支部决定仍组织大家逃跑，回部队去干革命，方法是把人员分散开来行动，两三个人结合在一起，各自想办法，找关系，准备好了就走。

临时党支部的决定宣布后，党员和群众分头作准备，他们一方面继续下井劳动，积攒路费，并麻痹敌人，一方面了解情况，寻找关系。一次，贾奎来和田玉中二同志去火车站探路被敌人抓住了，坐了两天牢，被把头领回来以后，又挨了一顿打。尽管这样，他们俩还是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到处找关系。经过努力，最后终于找到了老虎台的一个老工人，这个人姓鲁，是个山东人，他胆大心细，有一套送人的办法，但送一个人要20元酬金。除酬金外还需要路费，这两项加在一起，需要很多钱，这些钱对我被俘同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个人是承担不了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支部进行了研究，最后决定把同志们挣的钱集中上来，按计划统一使用，把同志们一个一个地送走。支部的这个决定深受大家的欢迎和支持，每个同志都节衣缩食，舍不得多花一分钱，把钱毫无保留地交给支部。

为了取得上级领导的了解和支持，使逃走的同志有着落，马苏义同志以行商的名义，给关内三分区首长孙定国同志写一封信，告诉他在抚顺生意做得很好，望来信联系。不久，孙定国同志以暗语回了信，指出部队仍在原地活动，一切很好。1942年冬，马苏义同志首先离开抚顺，为大家探路。他到达天津杨村后，就给大家来了一封信，指出可以按原计划进行。接着，我被俘同志有的化装成学生，有的化装成商人，陆续逃出抚顺。贾奎来同志是和雍梁栋同志一起走的，到沈阳后，干了一月的小工，后遇见了李育才同志，他们3个人又结伴而行。因为搭车钱

不够，他们就步行，沿途由贾奎来同志要饭供大家吃，白天他们藏在青纱帐里休息，夜晚朝西南方向前进。他们越过层层阻拦，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到达冀西山区，胜利地返回了部队。贾奎来一个党小组的，除梁义江同志外，其余同志都返回了部队。这些同志受到首长和同志们的热烈欢迎。经过审查，绝大多数同志很快地恢复了组织关系。马苏义同志恢复组织关系后，担任了司令部的支部书记。

南品、高光鉴、李新民三同志在承认了暴动领导人的身份后，敌人按《暂行惩治叛徒法》的规定，于1942年2、3月间把他们3个人押送到沈阳检察厅审理。这时，他们3个同志又秘密地建立了党小组，继续坚持斗争。经研究，决定翻供，不承认是暴动的主谋，还把主要责任往死者王振身上推，把原供改成“暴动是因为我们受苦受不了，才领导工人逃跑的”。在法庭上，他们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把煤矿的恶劣条件以及“特殊工人”的悲惨遭遇说得淋漓尽致。法官让从三家子村弄来的几个人作证。他们还是不承认，并辩驳说：我们在三家子村是出头露面过，但那是在王振的命令下行事的，王振是总头，他怎么能轻易出来作那些跑跑达达的事情呢。他们在法庭上说得滴水不漏，弄得法官们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在此以后，又先后开了5次庭，南品等3同志不畏强暴，一直坚持暴动的领导人是王振。敌人无法，最后于同年6月，以有反满抗日思想和组织暴动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判处南品同志有期徒刑7年，刑满后，转入劳动辅导营无期服苦役。判处高光鉴、李新民2同志有期徒刑各5年，刑满后，进劳动辅导营各服10年苦役。

1945年8月，苏军进入沈阳后，首先释放政治犯，南品、高光鉴2同志出狱（李新民同志于1945年2月18日于狱中牺牲）。

9月，我军到达沈阳后，刘兴起、宋庆昌、许彪先后到沈阳，
• 460 •

和我冀热辽十六军分区联系。不久，这支队伍奉命开赴沈阳，被编为二十一旅六十一团，宋庆昌任团长，许彪任参谋长，刘兴起任组织股长、总支书，马振江任一营教导员。经过近两年的斗争，宋庆昌等同志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们胜利地返回了部队。

1945年9月，我冀热辽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政委唐凯二同志率部到达沈阳，高光鉴同志闻讯后，立即到东站联系。曾、唐二位首长见了他，把他和南品等同志组织的队伍编为特务一团，并任命他为团政委，南品同志为团长。在此以后南品、高光鉴等同志便在鲜艳军旗的指引下，踏上了新的征途^①。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选粹》第四辑)

抚矿“特殊工人”反日斗争片断

李联益

(一) 龙凤搭连“特殊工人”大罢工^②

1942年，我被俘的抗日官兵1 000余人，被押送到抚顺炭矿龙凤搭连做矿工，称“特殊工人”，大队长是马同喜。不久，大队便秘密建立了党的支部（马同喜任书记）并组织土人开展反日斗争。

1943年11月间，马同喜、宋庆昌、吴持平等15名党团员积

① 本文多阅徐更伍、顾赤峰、夏俊卿、刘兴起、宋庆昌、许彪、南品、高光鉴、马苏义等同志回忆资料。

② 根据李景增回忆资料整理。

极分子秘密开会，研究打把头、砸戏院。第二天晚上，吴持平带领秘密组织的敢死队、支援队砸了戏院，并痛打了大把头牟景华。马同喜带领一部分工人，也趁混乱之机，散发了标语传单。传单上写着“戏给工人看”、“水给工人喝”、“打倒把头吃饱饭”。

砸戏院不久，又组织了千人参加的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吃饱饭”、“不准打骂工人”。矿工们砸了严把头的家。在声势浩大的罢工压力下，日本人被迫答应给每个工人增加20元工资。第二天，工人又找到洋工头杜勇，提出：吃饱、穿暖；撤销“特殊工人”住处岗楼；取消押送工人上下班等三项要求。迫使日方逐渐让步，到年末基本答应了要求。

1944年春，马同喜给同志们介绍了关内中国军民抗日斗争的形势，并用毛泽东的文章《论持久战》、《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启发教育大家。从此，特殊工人的抗日宣传活动更为活跃。他们在各坑内外到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2月里的一天夜里，青年敢死队50余人还到搭连各坑口和东窑地大架子底下散发张贴“把日本赶回东京去”，“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标语。戴玉文等6人还打死了两名伪警察，随后撤离抚顺。

事后，日本当局进行了大搜捕，并以所谓“抚顺龙凤鼠疫检查”为名闯进居民住宅翻箱倒柜，抓去34人。为了扼制特殊工人的斗争，日伪当局实行了更加残酷的统治。他们在特殊工人住的大房周围增设了电网，不许人随便出入。这时，党支部号召大家拿出当年关内打日本的劲头，坚持斗争到底。

1944年冬，宋庆昌指示崔云柱带领40人砸了日本卖店，把东西全部分给当地居民。

1945年8月，抚顺光复，搭连“特殊工人”大队改编为人民自卫大队，有1300人。9月开往沈阳，与冀热辽军区十六军

分区接头，后编为特务三团，宋庆昌任团长。从此，搭连“特殊工人”大队又踏上了解放全中国的征途。

(二) “王中队”包围警察所^①

1943年，抚顺西露天矿有个“特殊工人”组成的“王中队”。他们不屈于日伪的压迫与凌辱，决心冲出樊笼，重返抗日部队。然而，日伪统治异常严酷，到处都有宪兵队的明卡暗哨，没有通行证，简直寸步难行。强行冲出去那是盲目冒险，只有一个办法可行，就是找关系买通行证。可是眼下人们食不饱腹，衣不遮体，没有行动自由，上哪弄钱呢？大家再三研究，决定从坑下背煤。如果每天背100斤，就可到市里卖1元钱，背上两个月就可搞到60元。于是，大家分成小组开始行动。这是1943年12月8日晚，当一个小组的6个同志从坑下背着煤爬上盘道，走在路上时，被一个伪警察发现，他上前就打。他哪里想到这些特殊工人可不是好惹的。大家抽出背煤的棍子，一顿胖揍，把他打倒在地，尔后扬长而去。不久响起警笛。这时，如果大家丢煤就可以脱身逃走。可他们舍不得丢下，就这样，跑不多远，就被闻风而来伪警们追上抓走了。只有1人跑回了“大房子”。这时，“王中队”的人正在吃饭，一听报告，个个怒火中烧，几十个人分头找来了“家伙”集合起来。他们一来到南花园就把警察所包围起来。警察所里，5名同志正被吊打。一部分同志立即进去向警察要人。可是警察们不但不放，有的还拔出手枪威逼大家回去。一个同志手急眼快下了那个家伙的手枪，其余的警察一见不妙，只好说小话，还答应当即放人。一个伪警点头哈腰地说：“小弟不知是你们，以后你们再背煤时，只要

^① 根据刁志诚回忆资料整理。

报个话是‘王中队’的人，我们决不碰你们。”

伪警察威风扫地，“王中队”凯旋而归。可是过了不久，矿上劳务系的日本人便带着特务来了。他们挨个辨认，最后又把背煤的人抓走了。两个月来，“王中队”不断设法营救被抓走的人。一天，大家一起去劳务系警告日本人说：“是你们带人把人抓走，你们要把人要回来，人不回来，我们说死也不干了。”日本人担心事态扩大，只好答应大家。没过几天，被抓去的5个人终于回来了。打这以后，“王中队”的人先后陆陆续续逃离了虎口，返回了抗日队伍。

（三）组织“复兴中国友爱会”^①

1941年11、12月间，我原晋绥军几百名被俘人员被押送到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井。我们一到抚顺，就暗中寻找地下党，准备参加斗争。由于种种原因，始终也没有同党接上关系，于是南品（原二一二旅侦察科长）、马苏义（原二一二旅56政治部秘书）、熊言顺（原旅团副团长）3位共产党员便秘密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党支部成立后，为了能团结更多工人一起斗争，他们还联系了原国民党部队抗日被俘的九十八军官兵，组织了“复兴中国友爱会”。党支部3位同志以友爱会成员身份出现，成为该会公开的领导人。支部通过这个组织联络了许多非党同志，并以这个组织名义，组织了十几个班组，共有百余人，形成了一支新的斗争队伍。复兴中国友爱会提出了“宁可英勇的死，反对屈辱的生！”“为了祖国的解放和自己的自由，必须挺身而起，战斗到最后一分钟！”“工人们团结起来，向榨取我们血膏的日本

^① 根据贾坤南回忆资料整理。

帝国而战！”的斗争口号。我被俘人员从悲观情绪中振奋起来，终于在1941年12月21日举行了暴动逃跑。

这次逃跑斗争虽然是失败了，但对日伪当局的震动和打击却是很大的，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在当地群众中的影响。敌人进一步实行高压政策，用软硬兼施的卑鄙伎俩加紧了对“特殊工人”的摧残。经马苏义、张士俊、贾坤南研究，又重新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同时也恢复了“复兴中国友爱会”，并改称为“复兴中国乡友会”。这个组织由主要几个领导人联系活动。马苏义总负责，贾坤南负责组织工作，丁鳌负责日常联络及宣传工作，任学泰（原五十九团供给处长）负责后勤工作。龙凤坑由雍梁栋（五十九团卫生处政治指导员）负责；老虎台由张炳林（冀中军区的）负责；从冀中军区来的人，由王中（冀中军区译电员）负责；晋西北来的人，由李育才（原决死纵队八团二营副营长）负责。

组织定型后，同日伪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首先展开宣传教育，接着对敌进行政治、经济上的斗争，再就是有计划地继续组织逃跑。从1942年7月至10月，有一部分“特殊工人”先后逃离了虎口。

（四）砸日本卖店、仓库^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形势，极大地唤起了受奴役的抚顺矿工的斗争觉悟。1945年7、8月间，抚顺露天矿第二劳务系的近300名矿工自发地进行了一次砸抢日本卖店和仓库的斗争。

这天的上午，正在干活的露天矿第二劳务系的矿工费广生、

^① 根据徐振生回忆资料整理。

杜立得知日本人要用汽车把仓库的工人劳保用品全部拉走，于是他俩找到班长徐振生（以上3个均是特殊工人）研究怎么办。其时，日伪当局只顾奴役矿工加紧掠夺煤炭，就连起码的劳保用品也积压不发，很多矿工只好披着麻袋片、洋灰纸遮体。如今日本人却要将大批衣食物品外运，实在令人气愤。他们3人研究决定，立即堵住汽车，收回物品。随后，他们又联络了7名特殊工人，手持镐棒铁棍赶到西露天东大院大庙后的仓库。这时，日本拉物品的汽车刚刚开出库门，10名矿工一齐冲上去截住了汽车。押车的日本人高桥一头钻进卖店，企图从东门夺路逃出报信。费广生、杜立发现便暗示徐振生去东门口拦截。当高桥刚刚探出头时，徐振生一镐把他打倒。许多矿工闻讯纷纷赶来声援，到上午11点多钟，已有近300名工人和群众。人们怒吼着：不能把东西拉走！这是咱们的血汗！把东西分了！日本人见势不妙，仓惶逃走。愤怒的人们一涌而上，砸开仓库、卖店，分抢了面粉、衣物。

事后不久，日本宪兵便赶来搜捕，1名特殊工人牺牲，8名被抓走，收回部分物品。这次斗争又一次显示了抚顺矿工的斗争精神，并取得了一定胜利。此后，日本人再没敢拉库里的东西，看守仓库的日本人也躲到劳务系藏起来不敢露面。汉奸把头见主人没了威风，也乖乖地将工人应得的劳保衣物发给工人。又过了不久，矿工们迎来了抚顺光复，被抓的人也回来了。

抚顺煤矿特殊工人和广大工人群众反奴役反压迫的斗争精神，将永载抚顺工人运动的史册。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柳塘特殊工人的抗日斗争

肖 庄

1943年，本溪柳塘煤矿特殊工人中的八路军被俘人员秘密组织起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统治争取自由解放的地下斗争活动，1944年4月这一组织遭到破坏。有的同志被折磨死了，有的同志壮烈牺牲了，有的同志在蒙冤关头在群众的掩护帮助下转移到外地因而脱离险境。这就是当时由日伪奉天省警务厅掌握并称为“挑拨案件”的重要部分。我是当时家住柳塘的一个青年，因参与了活动亦遭逮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抗日战争胜利才获释放。事情已经过去40年了，每当想起牺牲同志的时候，总是悲痛不已。现在根据我的记忆予以追录，以示对牺牲者的缅怀之意。

一、特殊工人及其秘密组织

伪满的煤矿工人，身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把头的残酷统治和剥削，生活很苦，劳动强度很大，坑内经常发生事故，再加上恶劣的环境，死人的事是经常的。在本溪柳塘的南天门，埋葬着矿工尸体的坟丘，比比皆是。1942年4月29日发生瓦斯爆炸，死亡矿工1494人。为了防止工人逃跑，柳塘煤矿的周围都用电网围起来，出入矿的大门由矿警把守着。

1941年秋季开始，陆续来了特殊工人，又称为辅导工人，他们都是抗日战争中在关内打仗的被俘被捕人员。第一批先从济南来四十多人，住在矿里东部的大房子（工房）里。以后越来

越多，到1942年春就增加到1 000多人，他们来自太原、天津、保定、石门（石家庄）、青岛和济南等地，有八路军、新四军、中央军，还有游击队和老百姓。为了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统治，便把特殊工人集中居住的区域——从柳塘通往红土岭的电车道南面这一块地方，单独用刺线圈起来，与普通工人分开，他们都编成了小队、中队，上下班是集体的，平时不准到其它地方去，与外界完全隔绝，行动毫无自由，处境非常困难。

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争取自由解放，特殊工人中的八路军干部，秘密组织起来，进行地下斗争活动。

伪满时，我和金玉文都在柳塘矿里居住。我在兴农合作社工作，金玉文的父亲在煤铁公司工作，由于坑内发生冒顶事故死亡，当时金玉文年龄还小，公司为了照顾家属生活，采用他在炭业部管劳课（在南山）工作。他家住在柳塘电车道旁，离特殊工人住的地方只有30多米远。当时有个特殊工人田喜文，原来是八路军医务人员，因会看病在矿里诊疗所工作。他们开始接触，往来密切，逐渐成为知心朋友，并且金玉文首先参与了特殊工人的秘密活动。当时很多青年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压迫中国人民极为不满，不甘心当亡国奴。金玉文受田喜文的思想影响，由爱国而发展为倾向于共产党。我和金玉文的关系很好。1943年的第二季度，他对我说，现在特殊工人里边的八路军人员有个秘密组织，我们应该参与他们的活动。我当时虚岁22岁，金玉文18岁，我们都有强烈的反满抗日之心，都愿意干这些事情。我们都认为，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们在关内同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打仗，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我们对他们都很敬佩。由于我和金玉文思想倾向一致，通过金玉文，我也经常接触田喜文，并且也参与了特殊工人的秘密活动。

因为田喜文在矿内诊疗所工作，借看病之机可经常到特殊

工人的圈子里活动，出入很方便。

据金玉文和田喜文对我说：特殊工人的地下组织负责人为张顺和张永。

田喜文对我和金玉文说：张顺原名刘亚龙，是八路军的政治教员，曾在抗大学习过，理论水平很高，经常给干部讲课，这个人很有活动能力；张永是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干部，这个人很稳重，沉着多谋，毛笔字写得很漂亮，柳塘工人系（后改为管劳系）的大牌子就是他写的。他还说：张顺是共产党员；张永是共产党员；他自己也是共产党员。

二、向当地青年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大约在春节之前，一天晚上在金玉文家开会，参加的人有当地青年张廷芝、李继韬、徐殿林、徐国魁、马照钩、金玉文和我，特殊工人田喜文和张伯英也参加了。这次会主要研究组织起来反满抗日，当时有人提出左右倾问题，应该分开，但大多数人认为，现在关内都属共合作了，共同抗日，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反满抗日。田喜文同志在这次会上讲了很多。他讲了关内抗战的情况；讲了西安事变的情况；讲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都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我党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且还讲了应该怎样发展组织和要注意的事情；如要进行单线联系，不要取得横的联系，以免遭到破坏时造成更大的损失；在发展组织时应该注意质量，不要强调数量。等等。特殊工人张伯英没讲话。以后才知道，田喜文同志参加这次会，是事前同张顺和张永共同研究了，经他们同意派田喜文同志去的，而且去时在会上讲些什么，都是事前做了研究的。这是对我们这些当地青年进行的一次很好的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进行地下斗争方法和策略的宣传教育。张顺同志也去了，但未参加

会，是在外屋呆着的。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马照钧，在个别谈话时，他表示是左倾思想，还说他认识石岱宗、邓崇仁，马宗骏是他侄。这几个人都是我的同班和下班同学先后去关里了。从此，因为思想倾向一致，有共同言语，我便经常到他家去，他还借给我书看，我也转借给金玉文。

我们当地这几个青年第二次在后石沟开会成立读书会选举李继韬为负责人时，李继韬在会上讲的那些话，很大部分是田喜文那次讲话的内容。

三、寻求外面的配合帮助

特殊工人从关内来到柳塘煤矿，在电网圈里又单独用刺线被围困起来，与外界隔绝，人地生疏，处境艰难，秘密组织起来后，很需要外面的配合帮助。

金玉文和田喜文对我说：“张顺给张廷芝写了一封信，张廷芝没回答，张顺很着急，怎么办呢？”我们3个人研究，认为马照钧这个人是左倾思想，办法多，有社会经验，想找找他。田喜文与张顺研究同意了，我找马照钧谈，马同意后，告田喜文约好时间，在一天晚上，我领马照钧去金玉文家，马照钧与田喜文接谈。田喜文告诉了马照钧特殊工人中八路军人员已经组织起来，马照钧表示愿意给以帮助。此次接谈后，马照钧给张顺写了一封信，询问特殊工人情况和组织起来的情况，并表示如果有困难和要求可告他，将尽力给以帮助。这封信马照钧交我，我交金玉文，金玉文交田喜文，田喜文交张顺。不久张顺就给马照钧回了信。这封信张顺交田喜文，田喜文交金玉文，金玉文交我，我交马照钧。此信的大致内容是：

刘杰同志：

来信收到了，关于你询问特殊工人情况和组织情况，现在把情况告诉你。

我们这些特殊工人都是在关内打仗时被俘被捕的人员，有八路军、新四军、中央军，还有游击队和老百姓。我们被俘的时候，有很多人被杀了，我们这些剩下来的，被送到矿山来做苦工。他们来时对我们说，干半年就把我们放回去，到了半年又说一年，到了一年又说二年，到了二年又无限期了，实际上这是欺骗。

这里的生活很苦，工作很累，上下班都是集体的，行动毫无自由，坑内经常发生事故，还有很多人得病死了。大家感到，在这里呆下去早晚也是死，所以大家迫切要求自由，要想得到自由解放，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现在被俘的八路军人员已经组织起来了，由中心小组来领导。但是我们对外面的地理情况和时局情况均不了解，我们迫切需要外面给以支援。

此致

敬礼

亚龙

不久，马照钩给张顺写信说：你来的那封信，我已经求可靠人捎到奉天去了。张顺见此信后，很敏锐地察觉到这样做很容易出问题，便立即写信并摘回信说：这样做很危险，应该立即设法把信追回来（确实由此出了问题，后面将谈此事）。过了几天马照钩写信告诉张顺说：你写的那封信已经要回来了，请放心。这些往来信件，都是经我、金玉文、田喜文之手传递的。

李继韬是我在初中念书时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我和金玉文研究，认为这个人爱出风头，怕由他行动不慎出了事，所以读书会解散吧，咱们和特殊工人干。我便和马照钩谈了对李继

韬的看法和这个想法。马照钧对李继韬也有同样看法。过了几天张廷芝告诉我，读书会解散了。交的两个月活动经费也给退回来了。

张廷芝在初中念三年级时，我是一年级，他家也住在柳塘社宅，和我家只离二三十米远。晚上我和金玉文常到他家去，由于思想倾向不同，谈一谈就争论起来了，谁也说服不了谁，有时我们气得打他的嘴巴子。我们和特殊工人之间的活动情况，他是不知道的。我和金玉文从他家出来就谈我们的事，张廷芝的家却成了我和金玉文会合的地方了。

虽然我们同张廷芝之间的思想倾向不一致，当时是从反满抗日的角度出发，经常在一起，以后也共同坐过牢。光复后，我从他口中也了解到许多有关本溪县国民党部的情况，但最后终于因思想倾向各异，只好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

四、等待时机准备暴动

田喜文同志对我和金玉文说：张顺总想出来和大家见见面。当然我们也总想去看看他。

有一天我和金玉文去诊疗所找田喜文同志，想让他领我们去找张顺。田喜文未在诊疗所，在他们住处找到了他，并见到了张伯英，与张伯英打打招呼，点点头，示示意，没谈什么。田喜文见我们去了就出来和我们进特殊工人的圈子里去，但那天张顺未在。

后来田喜文告诉金玉文和我，张顺将出来看看你们，约好时间，我便告诉马照钧，在一天晚上，张顺和田喜文来到金玉文家，等了好长时间马照钧才来，因为到了特殊工人晚上点名的时间，不能再呆下去，张顺和田喜文只好走了。又过了几天，约好时间，我带领马照钧去金玉文家。田喜文、张顺、张永都

来了。在这次会面时，着重研究了时局情况和等待时机准备暴动问题。马照钧首先谈了时局情况，他说日本军队在关内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打仗，战线太长，力量分散，兵源不足，供应困难，现在战争失利，节节败退，东北是日军物资供应的主要基地。最后就是全部放弃关内和太平洋，也不能放弃东北。张顺说：现在要积极准备，等待时机，适当的时候，进行暴动。特殊工人里边已经组织起来，首先要把八路军当小队长的掌握住，因为他们掌握一批人，行动的时候这些小队的八路军人员没问题，是骨干力量，这些小队的中央军绝大部分人也能跟着走，其他小队的八路军人员也能跟着走。暴动的时候烟火爆竹等作武器夺取日本守备队的枪支。从柳塘过峙经影寨屯去东山沟打游击，为取得群众的支持，由张顺起草告本溪人民书。如果打游击坚持不下志，就去热河投奔八路军。行动的时候组成几个队，由张顺和张永指挥，并亲自带领一队，田喜文、马照钧、金玉文和我，每两人带一队。马照钧负责印传单。

为了将来的暴动，在外面的同志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我和金玉文、田喜文同志接触时，谈论了需要了解本溪一带日本部队的驻地兵种及其装备情况。

柳塘水源地，驻有日本守备队一个小分队约 10 余人，有步枪 10 余支，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金玉文说茨沟也有一个小分队。

我对金玉文和田喜文说，鞍山沟口花园附近有一个守备队兵营，驻有步兵一个中队约 100 余人，有步枪、轻机枪和重机枪。我在中学念书时游行进去过，在兴农合作社工作时，时局紧张，防空训练，去学过高射机枪，所以这个情况是准确的。当时没有详细研究，是将来暴动时避开这个部队或者去袭击。

为了给将来暴动做准备，需要设法筹划弄到一批枪支。金

玉文说，他有亲戚住在乡下，原是抗联的，因为坚持不下去，停止活动，把枪支插（藏）起来了，有五六十支，这批枪支需要时他能弄来。金玉文曾亲自对张永同志讲过这个情况，如果需要现在就可以去取。他是很有把握的。张永同志说，先不要去取，待以后需要时再去取。

我向金玉文和田喜文说过，柳塘警察派出所有3支步枪还有短枪，只3名警察，很容易弄来，需要时找几个特殊工人来就行。还有警察局的2名便衣警察均住在柳塘社宅，经济股警长赵彤勤有1支匣子枪，特务股警长罗玉灿有1支撸子枪。他们平日都把枪别在屁股后，这也很容易弄到手，需要时我找几个特殊工人，在他们上下班时就能下来。

我们还研究过：将来“行动”时，要切断通往警察派出所、警备系和守备队等处的电话线以及通往柳塘矿内的电源线，我们还察看了这些线路。

金玉文还说，特殊工人能制造武器。我说，如果制造手榴弹、地雷，需要炸药和雷管等，南山（即茨沟）东面山坡中间有一个“炮房子”储存这些东西，原来李德喜就是看“炮房子”的，可以想法弄一些。因为1932年至1935年我在南山居住，1936年搬到柳塘的，我知道此地。

将来“行动”时，还需要本溪县地图。我知道本溪县公署地政科有，通过关系能弄来。将来印刷传单时，除马照钩负责印刷外，需要油印机、钢板、蜡纸以及纸张等这些东西时，我从县公署和兴农合作社都能弄出来。

金玉文还对我说，特殊工人要派人去热河与八路军取得联系。据以后了解，张永、张顺和田喜文等曾研究过，为了取得组织上的领导和支持，张永同志准备要亲自去，因为没弄到证件，未来得及走。

当时正在积极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但因不久遭到敌人破坏，未能来得及行动。

五、敌人开始逮捕

1944年4月21日本溪湖市警察局开始逮捕了。

4月22日的上午，我在从菜市往北山去的小胡同里碰见了马照钩的母亲。她对我说：“坏了，出事了！昨晚照钩被捉走了，现在还有人在家看着呢！”又问我：“有什么事？”我只好安慰老人家说：“不要紧，没事，别着急。”如果我不看见马照钩的母亲，我还准备到他家去呢。

我回家去，得知特务又去捉张廷芝，张廷芝已经闻讯躲开，去捉时未捉到，把他妹妹和妻子捉去。

我找到金玉文，把马照钩被捕的情况告诉了他，后来他告诉我，“张顺和田喜文也被捕了”。不久，金玉文告我，张永和张伯英已跑了。我们两人核计一下，咱们也先躲一躲吧。于是，我们就都离开了柳塘，我到崇水村赛梨寨外祖母家去了。

六、张廷芝自首

时间过去一个月了，再没听到什么动静。张廷芝的妹妹和妻子在警察局遭严刑拷打，也没放出来。本来捉张廷芝妹妹和妻子的目的，就是想追问张廷芝的去处，她们两个人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并没有说。日本人再蛮横不讲理，最后也不能把家属当做政治犯来定罪。可是5月下旬突然听说张廷芝投案自首了，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6月5日我的姨父薛世田率领特务早川正和马贵禄到赛梨寨我外祖母家将我逮捕。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我双手顺着布拉下来用绳子绑在腰上并用上衣盖上，脑袋用包皮包起来。当

天从泉水乘火车押送到本溪湖市警察局拘留所里。以后我才知道，特务把我逮捕后，曾去我家搜查，但我母亲已将我的一些书籍以及石岱宗去关里临走之时与我一起照的相片等都烧了。以后审讯时还问过我石岱宗上哪去了。我说，他因家事辞职到哪去了不知道。

拘留所就在警察局北部的一间大屋子里，有9个小屋，南面4个北面5个，中间是过道。每个小屋有两米宽两米长，前面和后面竖立着约10公分宽的木方，像个动物圈的笼子，左右间壁墙是在木方上的两面订的胶合板。在押犯人绝大部分都是刑事犯。我被关押在北面的第二个小屋里。我一进来，徐国魁（在第一个小屋里）和张顺（在第三个小屋里）就看见我了。但我还没看见他。当看守不在屋时，张顺就敲间壁墙，小声喊“肖承善。”当时称为“打电话”。我走近间壁墙也敲两下，便说：“我是肖承善。”他就说：“我是张顺呀！”“你也进来啦！”我说：“是啊！”

张顺对我说：“我给马熙钩写的那封信，捎到奉天被特务骗去了，往回要时把信照了相给拿回来。审讯时间信的事，便说不知道，后来，实在追得紧了，因为我知道张永已经跑了，便说，可能是张永干的吧。把敌人已经骗过去了，一个多月不审讯了，案子快结束了。张廷芝一自首把真实情况讲出来，审讯时把相片拿出来让我看了，不承认也不行了。把以前的审讯完全推翻了，所以才把你和金玉文捉进来，张廷芝不自首，你和金玉文就没事了。”张顺还告诉我：审讯时尽量把情况说的简单点，个别接触的事故人没掌握不要说。

我听到张顺同志对我讲的这些情况以及告诉我在审讯时应该注意遵循的原则，使我心里有了底，明确了应该怎样来应付敌人的审讯，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个

别接触的那些活动，敌人没有得到一点情况。

马照钧还告诉我：“张顺给我写的那封信，由张万昌捎到奉天被特务厉广孝骗去了。他在奉天小南门里（以后了解为大南门里，即东华门外，劝业商场附近）开个育美屋，卖体育用品，做为特务活动的据点。特务审讯时问信的事，我知道张廷芝已经跑了，便说信是从张廷芝手中拿的，详细情况不知道。你和金玉文都没事了。张廷芝一自首，把真实情况讲出来，所以才把你和金玉文捉起来。”

张顺还说：特务股长井上亲自对他审讯，警尉（后改为监督警尉，是“满洲人”中级别最高的）乔世芬给当翻译。日本人开始时，也曾用了软招子，摆上酒菜，还说什么你把事情讲出来就放你出去。这当然是骗人的鬼话。这也说明敌人对张顺是何等的重视！但最初时，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东西，都被张顺给骗过去了。

特务审讯时，严刑拷打是经常的，方法也是多样的。拳打脚踢，用木棒、竹剑（练武士道用的）打，手指间夹钢笔杆，上大挂（就是双手背到后面用绳子绑上，吊起来），等等。但这些法西斯残暴行为都改变不了革命志士之心。

本来我和金玉文是有充分时机躲开的，既然要躲就要远走，更不能到亲属家去，那时由于我们幼稚缺乏经验，政治上不成熟，最后我们两个人还是没躲了。

我被捕之前，对我们这个事情怎样被敌人发觉的是不了解的，我被捕后知道了。可是张顺的那封信，只能暴露柳塘特殊工人中有个秘密组织，但具体人是谁又是怎样被敌人发现的还不知道，而且被捕的特殊工人基本上没露。后来，才知道在柳塘社宅居住的朝鲜人（当时称为日本人鲜系）特务罗玉灿插了手，布置了任务。特务厉广孝的父亲厉勉原是我地下党成员，

被日本人逮捕后投敌叛卖给日本特务机关充当特务了。厉广孝是哈尔滨工大的学生，当他和他的同学要去关里时，临行前告诉了他父亲。走后厉勉怕日本人知道后追究他的责任，便向特务机关报告，在山海关把这些人全捉住了。又通过厉勉的关系，这些人便当了特务。厉广孝当了特务以后确实给日本人干了许多事，在北满破坏了许多，又到南满来了。厉勉是厉男的哥哥，厉广孝冒充“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为了使人对他“信任”，也曾以八路军的干部厉男作为金字招牌进行政治上的欺骗。

七、盼望胜利和准备继续战斗

在拘留所，环境非常恶劣，一天两顿饭，一顿是一盒用木制小板盒装的高粱米饭，只能有现在铝制饭盒的一半大小，装有3两饭，放三四条白萝卜咸菜。没有筷子犯人就从隔壁墙上劈下一小条胶合板的木片当勺子用，这个犯人走了留下，其他犯人来也再用。有时一天给喝一次水，有时还不给，喝水时就是用小水桶接一下子自来水，让大家轮流喝。十天半个月给打一桶水让大家洗洗脸。4平方米的地方经常押着十几个人，多时到二十多个人，晚上睡觉时一颠一倒还得“睡小面”（就是侧面躺着）。如果起来撒尿，回来，就没地方了，只好躺下来用身子硬挤。昼夜不脱衣服，衣服上、地板缝里虱子多得很。经过一段时间，就不审讯了。家在当地的，允许家人给送饭。当时我家总是给送小米干饭，炒完做成饭团，用报纸包上送来。可是特殊工人在本溪没有家，谁能给他们送饭啊！徐国魁家在草河掌离草河口车站还有几十里路程，也不能给送饭。在这样情况下，革命情谊非常可贵，宁肯自己少吃或不吃，也要让共患难的战友来吃。可是当我把家里给送来的饭分送给他们时，他们都是百般不要，他们都知道我患肺病咯过血，让我多吃一些。张

顺、杨照耀原来是干体力活饭量大，他们比我早进来一个半月，更需要啊！开始时分着吃，第二天，第三天，……总是这样让来让去也不好办。后来就这样吧，我吃家送来的饭，把拘留所给我的饭给他们吃吧。包饭的报纸，就成了我们在这里的唯一读物，互相传着看。一张报纸，几乎全都看到，但关内战争、太平洋战争既是报纸的重要新闻，也是我们最关心的消息，尽管敌人竭力吹嘘其赫赫战果，但也流露出节节败退的景象。大家看到这些消息，就互相议论，认为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为期不远了。大家都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张顺同志曾经说过：只要不处以死刑就不要紧。

由于长期在这里关押，营养奇缺，不见阳光，体力极弱，田喜文同志病死在这里。其他同志为了迎接胜利日子的到来，为了准备将来的继续战斗，每天在这里原地跑步，锻炼身体。

据一些经常打官司几次进来的犯人说，监狱比这里强的多，在那里虽然干点活，但能到外面活动见见阳光，给的饭也比在这里的多。当然这个“强的多”也只是相对而言。解放以后，奉天高等检察署的检察官来本溪进行复审，看来，将根据《治安维持法》（专门惩治政治犯的法律）给判罪，但估计还不致判处死刑。我们也希望能够早点把我们送到监狱去。

八、分别及就义

1945年4月1日我们本溪的这几个当地青年，从本溪湖市警察局被押往奉天第一监狱，特殊工人张顺等同志仍押在警察局的拘监所里。这天上午，临行前，与张顺同志只能无言相握，相互示意保重，但是未想到，这竟成为最后的永别。我们从警察局出来到本溪湖车站的时候，家属均在车站候车室前等候看望我们，但不能上前说话，只能看看而已。到监狱里，就都给

带上脚镣子。在这里，只是政治犯和杀人犯等重大罪犯才给带上脚镣子。这几个人被分散开，均押在一舍，这是未判决的犯人关押的地方。一个大屋子约有三十多平方米，住二十几个人。马照钧由奉天北陵的拘留所送到第一监狱押在二舍。在监狱里虽然一天两顿饭，但每顿一个人一个高粱米饭坨，约有4两，还能有一些炖茄子干或萝卜干、云豆干之类的菜。监狱里还有一套“规矩”和“行话”，每屋有一个“炕头”，多是关押时间长案情重的犯囚（当时对犯人的称呼），来协助管理犯人。看守警对犯人敲诈勒索是常事。每天上班的时候带一些“煎饼包”（一张煎饼包些炒干豆腐、豆芽粉之类的素菜）卖给犯人4个一份就是10元钱，真是一本万利。如果新进来个犯人有件新衣服、新毯子之类的东西，看守警看中了，就可通过“炕头”设法给弄下来。不然“老爷”（犯人对看守警的称呼）就要找茬给点苦头吃。最后“炕头”给说情，使你“明白”了（就是给老爷“进贡”）才算了事。当然对政治犯还不这样。未判决的犯人不出去劳动，只是在屋子里给拆日本陆军传染病院的被套，不少犯人得了高热病。5月初我也得了上，发烧超过40度，被送往五舍（病监），发高烧最好是发汗，囚犯对此也有“经验”，就是大量喝凉水，然后用被子捂上发汗，当然不吃药硬要发一身透汗也是很遭罪的，并且体温降下去也总反复。

5月25日奉天高等法院治安庭（专门审理和判处政治犯的司法审判机关，审判官、书记官、翻译官都是日本人），开庭宣判，对我们这几个人分别判处5至20年有期徒刑。张廷芝、李继韬、马照钧20年；徐履林15年，徐国魁、金玉文和我10年，张万昌5年。

金玉文和马照钧也先后到五舍来了。金玉文对我说：“不行了。”我便鼓励他说：“不要紧，再坚持一下，日本鬼子快要完

蛋了，我们很快就能出去了。”但以后听说金玉文同志病死了。

在五舍和我住同屋有个政治犯秦学明，是小学教员，家住奉天小南关，自称是国民党员，他还炫耀他认识东北地下国民党负责人罗大禹，又名魏忠诚，吹捧此人如何能干；他还认识张宝慈（此人光复后是国民党沈阳市党部书记长）。因为那时候都不隐瞒自己的思想倾向，谈一谈就争论起来。他说：“有的人看几本《门槛》、《夜未央》（均为苏联书籍）就盲目左倾。”当然这是旁敲侧击，也包含着对我的讽刺。我出去“放风”见到花喜露（笔名田贲）时，对他讲了这个情况，花说：“他何曾不是盲目右倾呢！”

我在一舍时，听到同屋政治犯于家麟（笔名驼子）讲了许多关于花喜露的情况，花喜露是左倾思想，被捕后表现很好，虽然遭到鞭刑拷打，但从他口里没有露出其他人的情况。最后只承认左倾思想不承认组织，但一个人的左倾思想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呀；当追问他他的左倾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时候，他说是从书上看来的。就连日本“法官”都认为花喜露的文学修养很好。当我看到他时，因患心脏病很严重，脸和腿都肿了，头发也脱落了，后来听说光复后出狱1946年病死在沈阳小河沿盛京施医院。此死是我地下党的成员，已追认为革命烈士。他在辽宁一带青年中的影响是很大的。本溪一些青年人的左倾思想都是通过他直接或间接来传播的。

当时在奉天第一监狱里关押的政治犯有不少是青年学生，还有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委员侯天民、王玉文。

1945年8月1日奉天第一监狱一批犯人被转送到外地监狱。我被押往海龙，马照钩被押往营口。在海龙监狱里听到“八·一五”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押的犯人都兴高采烈，欣喜若狂，要求监狱当局释放犯人，当时监狱管理人

员还不敢做主，拖了几天才把所有犯人都放出去。因我身体很不好，腹泻严重，出狱后在客栈休息几天，买点药吃，便乘火车经抚顺到沈阳又换车到本溪。回到本溪就打听特殊工人张顺等人的消息。不幸，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的一个夜间，于本溪平顶山把他们杀害了。

（摘自《本溪文史资料》）

北票煤矿“特殊工人”暴动逃跑

张九英

1940年夏秋之间，日寇从山东、河北、河南以及黑龙江等抗日前线押来北票的“特殊工人”约一千三四百人，分别集中在冠山“协和寮”和台吉“报国寮”内。所谓“寮”是独身宿舍的意思，但在北票煤矿的“寮”实际是集中营和监狱，到处都有警察、宪兵、特务、汉奸、狗腿子们轮流看守监视，高墙电网，森严恐怖。这些“特殊工人”既没有自由，劳动生活条件又极坏，许多人由于吃不饱，生病得不到治疗或被打而死。甚至有的带气就被活埋。由于这种劳动和生活条件，再加上这些人都是抗日军民，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屈辱，因此暴动逃跑事件时有发生。据有关材料不完全统计，自1940年5月至1943年春，逃跑事件十来起。在这些起事件中少者逃出四五人，多者逃出二三百人，共计逃出七八百人。著名的夜砸报国寮暴动事件就是在这期间发生的。“特殊工人”暴动逃跑使日寇不得安宁，不得不于1943年将一部分押送北满，一部分放出做劳工。

与“特殊工人”暴动逃跑的同时，还出现了多起被骗劳工

逃跑事件。1943年3月间，日寇为了补充劳动力不足，就派人到兴城、绥中招骗劳工。他们以移民的名义，由当地乡、保长将1600多户渔民卖给了矿上日本鬼子。这些渔民到北票煤矿后，因生产条件极差，吃不饱穿不暖，受气挨打又是常事，因而死了不少人。因此，这些渔民在特殊工人暴动逃跑的影响下，也纷纷逃跑了。到1945年祖国光复，仅剩下200多户。

（摘自《北票文史资料》第一辑）

电网工人的回忆

吴承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资本家宗相金吾来到鸡西，把手伸进了由哈尔滨资本家徐鹏志经营的黄泥河子的裕边煤矿（现恒山煤矿老一井）。1938年宗相金吾吞并了裕边煤矿，于1939年4月正式命名为鸡西煤矿。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奴役矿工，镇压工人的反抗和赚取无偿劳力，在恒山、城子河、清道等各大煤矿建立了“特殊工人训练所”，把从各地抓来的抗日战士、无辜百姓和逃避未遂的矿工，扣上“政治犯”、“思想犯”等罪名，关进电网里，进行残酷迫害和无偿劳动。据伪满鸡宁（现鸡西）宪兵中佐队长堀口正雄供认，从1942年到1943年，共逮捕我地下工作者的所谓“有政治问题”的矿工460多人。其中有20名无辜矿工经宪兵司令部批准，送哈尔滨日军七三一部队（石井细菌部队）作了细菌试验的牺牲品；1945年春，恒山煤矿工人宫化敏、伍元同和徐守

密等因为得罪了把头，被说成“八路”抓到鸡西宪兵队，坐水牢、上老虎凳、灌辣椒水，被活活折磨死了。

凡是抓进特殊工人训练所的所谓“犯人”眉毛被剃光，衣服被扒光，换上囚衣，编上号头，不准互称姓名，不准与外界来往。他们被关进四周筑有炮楼的电网里，所以当时都叫“电网工人”。

训练所名义上“训练有期”，实际上劳动无日。每天由武装矿警押送下坑刨煤。矿工把下坑比做“下地狱”，什么时候折磨死了，就算“升天堂”了。据恒山矿老工人张明远回忆说：“伪满我在山南电网的号头是7502号；原恒山矿工会主席李明同志是九千多号。这说明伪满恒山煤矿山南电网最少关押过9 000多人。这上万名矿工，除逃跑300多人，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电网里活着的只有百多人，其他的人全被活活折磨死了。”

伪满恒山特殊工人训练所设在恒山煤矿南沟里，所以又叫“山南电网”。山南电网于1942年建成，有十几名日本人和3 000多名武装矿警看管，警戒极为森严。

张明远是伪满沈阳铁岭区的一个模型工，1942年农历九月初六被日本兵抓进恒山矿山南电网的。跟他一块抓进电网的一共有124人，分到城子河煤矿电网64人，分到恒山煤矿山南电网60人。关进电网之后，把头就把抓来的人的衣服全部扒光，换上一套黑色的更生布囚服，背上用红油漆写上一个号码。张明远的号码是7502号，从此，张明远的名字也就由“7502”所代替，没有人再叫他的真实姓名了。

电网工人住的是大房子对面炕。吃的是每顿一个糠菜团子和一两碗稀汤粥。由于吃不饱，工人只得拣些烂菜根和菜帮子，塞到洋铁盒子里煮熟了充饥。因为吃不饱，而且一天还要下矿井干12小时的活，加上日本人和把头的无情折磨，电网工人成

批死亡。跟张明远关在一起的60名工人不到一年时间就死了48人。

据鸡西矿务局东海煤矿董仁贵回忆说：“1943年农历八月十四日我因逃跑被抓进了恒山煤矿山南电网，从此我成了‘犯人’。每天排队上工，4个人一横排，两边有拿手枪的矿警押着，后面一挺机关枪跟着，坑门口还有日本人把着。每天每个人要刨两矿车煤，干不完不准出坑。不少电网工人活活累死或被把头活活打死在坑下。由于日本人把电网叫‘训练所’，每抓来一批劳工，就叫‘训练’一期。我们电网工人心里有数，什么时候死了，就算在训练所‘毕业’了。我在‘电网’里干了18个月，这18个月中，共押来23期电网工人：从奉天（沈阳）押来9期、从青岛押来2期、从哈尔滨押来5期、从牡丹江押来7期，每期都在三五百人左右。到我逃跑的时候，工人只剩下127个了，其余近万人全死在电网里。”

从沈阳抓来的60个电网工人，进电网的第一天就得往外抬尸体。张明远说：“我们这60个人分成15组抬。一次一顺一侧抬2具尸体。我们从早上6点一直抬到下午2点才抬完。可是不几天，死人仓库又摆满了尸体，因为电网里一天至少要死五六个人。从哈尔滨一次抓来128人，除24个有来头的让日本人放走了之外，其余的全死在电网里。”

恒山煤矿老工人刘庆祥说：“山南电网工人的尸体都扔在山南万人坑。有一次，日本人到万人坑视察后，为了销尸灭迹，让把尸体烧了。当时万人坑扔了800多具尸体，码了17垛，浇了汽油烧了14天才烧完。从这以后，万人坑经常烧尸，所以人们又叫它‘烧人场。’”

不少工人因不堪日伪反动派的凌辱而自杀。恒山煤矿老工人刘庆祥亲眼看到在山南电网发生的一起悲惨事件：一个妇女

领着3个小孩到山南电网来探望她的丈夫。她在电网外边等3天3宿也没有见到丈夫的影儿。原来她的丈夫因病重不能下坑。第四天早上，不知谁告诉他有个妇女领着3个孩子在电网外边转游了3天；他支撑着身子跑到院子里一看，正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眼泪汪汪地叫了一声“孩子他妈——”就昏倒在地，让姓熊的警备班长看见了，当着他妻子和孩子的面将这个电网工人一顿毒打。他的妻子没有跟丈夫说上一句话，反而招来了一场灾祸，伤心地领着3个孩子哭着走了；等这个电网工人醒过来不见妻子和孩子，一阵心酸，就拿着一把炉钩子搭在电网上自尽了。

电网工人因忍受不了日本法西斯的残酷压迫和折磨，经常发生逃跑事件。1943年冬天，有3名从沈阳抓来的工人在下班回来的路上，趁天黑警备不注意的机会逃跑后，警备队紧追不放，当场砍死1名，另1个脑瓜砍掉一半，抬到电网里还“呼噜，呼噜”直喘粗气，很快就咽气了。只有一个叫陆义良的跑到山里躲藏起来，没有被警备队抓住。后来听说这个电网工人因在山里躲藏时间过长，10个脚趾全冻掉，逃到梨树镇不久也死了。就在这年冬天，还有个姓徐的电网工人逃跑被抓回后，扒光衣服，绑在电线杆上“冻冰棍”。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下，整整冻了2个多小时，抬回电网后，手指脚趾都冻烂了，被活活折磨死了。

伪满城子河煤矿的特殊工人训练所建于1942年，训练所有个杜把头和一个叫松田的日本人凶残狠毒。据老工人王宪文、张学文回忆说：“松田为了区别工人的不同来源，把各地抓来的电网工人剃成不同形式的‘鬼头’：从沈阳抓来的头发中间剃道沟；从牡丹江抓来的剃掉半拉头；从密山抓来的剃去眉毛。”王宪文是城子河煤矿第一期训练所工人，号头是3284。他说：“电网工

人每天由武装警察押送到二坑刨煤，当时正是初春季节，二坑下边的顶水很大，我们整天泡在凉得刺骨的水里干活，不少工人得了关节炎和水肿病。有一天，我们38名电网工人正在坑下装车，忽然顶石‘哗哗’往下掉，眼看就要冒顶。我们急忙跑到大巷躲避，不料碰上松田和杜把头来了，硬说我们是偷懒，是破坏‘大出炭’，抡起榔头棍一顿乱打，逼着工人下去干活；我们刚刚跑到工作面，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顶板冒落了，38名电网工人除我的矿灯被日本人打坏，趁黑躲藏起来侥幸逃脱外，其他37名工人全部葬身井下。”

日本法西斯为了镇压电网工人，制定十多种罪恶的刑罚。据现城子河煤矿前总工程师李玉洪同志作证说：“当时城子河特殊工人训练所常用的刑罚有：灌凉水、上大挂、活埋人、蚊子叮、冻冰棍、烤烘炉、烙铁烙、过电网、大剪头和狼狗掏心等10种。”李玉洪曾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日本人、把头给电网工人施用各种刑罚，真是骇人听闻，惨不忍睹。

灌凉水：1943年冬天，王宪文在下班回来的路上拣到一只小死狗，想偷偷地带回电网煮着吃，不料被警备发现，骂他是条馋虫，狠狠地给了王宪文一枪托，并逼着他生嘴小死狗，然后把他绑在有3根皮带的板凳上，一面往他嘴里灌凉水，一面晒他的肚皮；灌进去的凉水又连血带水从嘴里、鼻孔里冒了出来。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活埋人：1942年，城子河煤矿训练班几个工人用木板搭在电网上逃跑了，其中有个姓黄的是近视眼，偷越电网时碰在电网上，被松田抓住。松田把电网工人都赶到一个土坑跟前，然后让警备把姓黄的推到坑里，再往里填土。当土壤填到他的胸部时，只见他豆粒大的汗珠往下淌，脸和眼睛都憋得紫红……这个姓黄的工人就这样被活埋了。

蚊子叮：1943年7月，从丰田抓进城子河电网的一个叫汪品清的工人，在上班的路上，忽然举起帽子一挥说：“工友们，快跑呀……。”60多名工人在他的指挥下四散奔逃；松田马上夺过警备的机枪，向逃跑的工人扫射，当场打死50多人，跑了3个人，抓回5个人。这天晚上，松田把电网里的工人召集到城子河水源地西南沟的一棵电杆跟前后，命令警备把一丝不挂的汪品清绑在电线杆上；电杆上安着一个很亮的灯泡，蚊子看到灯光从四面八方飞来，不一会儿，汪品清赤条条的身子落满了黑黝黝的一层蚊子。汪品清被蚊子叮得浑身青紫，悲惨死去。

冻冰棍：1942年，正是隆冬三九天，电网工人下班回来正在外边清点头号，从鸡宁（今鸡西）街里抓来一个姓陈的老头，松田命令警备把老头的衣服扒光，绑在电线杆上，然后往身上浇凉水。没有多长时间，陈老头的身上由红变紫，由紫变白，冻成了冰棍，松田指着冻死的老陈头对电网工人说：“谁再逃跑的，统统这样的干活！”

大劈头、过电网和狼狗掏心：1943年，城子河煤矿特种工人训练所30多名工人逃跑，被抓回10人，其中8人当众用大砍刀将脑袋劈成两半；2人过电身亡；1名活埋；有个姓刘的工人被扔进狼狗圈，几只凶猛的狼狗扑上去将他活活地咬死了。松田在施行暴刑的时候，还强迫所有的电网工人围观，叫“杀一儆百”！

江成恩回忆：1945年春，恒山煤矿电网工人暴动逃跑，抓回30多人，日本人指示警备把这30多人用铁丝穿起来，绑在铁溜子上，下面架上炭火烤，烤得这30多人嗷嗷直叫，哭声震天。江成恩和另外几个工人曾亲眼看到这30多个工人被活活烤死。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烤烘炉”。

伪满恒山煤矿和城子河煤矿电网里幸存的董仁贵、张明远、

王宪文和高兴文等一些老同志回忆电网工人的悲惨遭遇时，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共产党把我们从水深火热的地狱里拯救出来，我们就是逃出电网也活不到今天，我们决不能让军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重演！”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协文史办供稿）

对修筑军事工程 劳工的虐待与残杀

修筑海拉尔北山要塞劳工的悲惨生活

张玉善口述 隋福祥整理

伪满康德二年（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家乡河北滦县北小寨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致使生活无法维持。无奈，我被迫离开家乡，来到郑家屯。当年2月的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一伙招工的人，他们声称：“去东山里开荒，每天工钱壹元伍，吃三顿馒头。”我信以为真，就报名应招，没想到却掉进虎口。

我们这些应“招”的人，被集中在郑家屯一个大四合院的旅馆里，一共有400多人。第二天，我们这些人就被装进五六十个大闷罐车厢里，车门上锁，只留一个窄缝，车开后，有一个去过东山里对当地地形比较熟悉的人对我们说，“这不是去东山